

■ 学人文库



赤壁之战研究

张靖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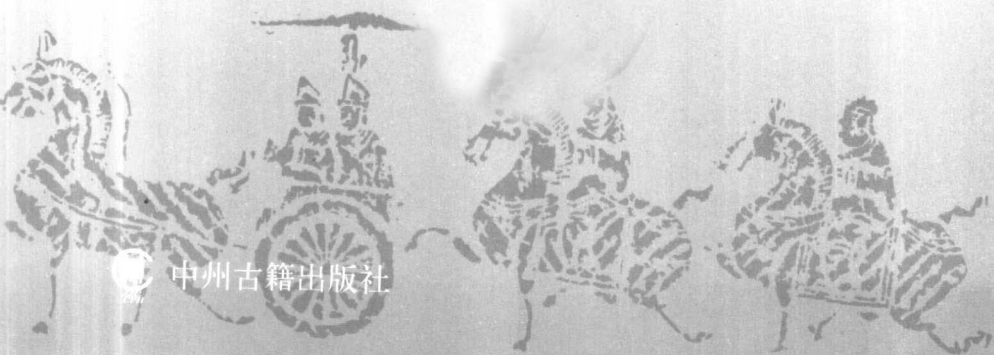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学人文



赤壁之战研究

张靖龙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壁之战研究/张靖龙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6

(学人文库)

ISBN 7-5348-1921-0

I. 赤… II. 张… III. 赤壁之战(208) - 研究
IV. K234.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556 号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责任编辑:张燕萍

责任校对:张武松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泓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269 千字 **印数:**1—3 000 套

版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1921-0/K·755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1

学
人
文
库

绪 论	建安十三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1
第一章	君臣互择:平世三公坐观江汉·····	31
第二章	枭雄抵巇:刘备寄寓与集团的荆州化·····	57
第三章	烈士驰骛与东吴西进·····	81
第四章	“当先定荆”的统一战略与曹操南征·····	102
第五章	荆州整合趋势的逆转与刘备放弃襄阳·····	121
第六章	江陵争夺与曹、刘荆州之得失·····	137
第七章	赤壁战役时间考论·····	155
第八章	赤壁之战战地考论(上)·····	179
第九章	赤壁之战战地考论(下)·····	215
第十章	赤壁之战战争规模及进兵路线考论·····	242
第十一章	战略锁钥夏口与曹操东征之成败·····	277
第十二章	赤壁之战战略地理论·····	294
第十三章	曹军赤壁疾疫诸说评议·····	332
第十四章	赤壁之战气象问题刍议·····	362

绪论

建安十三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1

学
人
文
库

一个受了欺骗的回顾，会把不可预料的事情，错当作事有前定。历史上一切久已确定的事情以及不能改变的事情，对于人们所发生的催眠作用，往往会使天真的人错认为：这些东西有着一种隐藏着的目的；并使虔诚的人错把历史的裁判，褻渎地当作了上帝的裁判。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历史中的“如果”》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对来说，所谓的“必然性”一般体现在长时段的历史宏观走向上，而短时段的微观历史过程则更多地带有随机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动荡的岁月中，决定历史进程的参量和变量太多，同时在当事者的主观选择或多向互动的作用下，历史发展常常呈现出随机性很大的变异轨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走向统一还是走向分裂，两种因素都存在着。当时的中国，无疑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历史的规律性表现为：当某种条件出现后，与之相应的规律便会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规律与相应条件的精

细对应关系。每一个必然性,都有着极严格极确定的条件;同时在其所辖范围之内,包含着很多,甚至无限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历史处于由过去、现在向未来发展的进行时态中,是一个向未来开放、未决的生成与流变进程;在自身流变过程中,逐渐向某种“可能世界”靠近。

但是,历史的可能性品格,却往往由于时间的流逝以及事件的不可逆性,而让后人产生误会。毋庸置疑,一切历史都曾经以未然的“现在进行时态”呈现于临场者的眼前。可是,历史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总是在尘埃落定之后,总是在“事过境迁”的后人眼中显示其意味,呈现为一种已然“过去完成时态”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历史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性中最终实现了的某一结果)。历史的研究者,总是很自然地以“当下”为基点,来反观既往历史,原本鲜活、流动的生成与发展进程已演变为静固的空间性形态:赤热流动的岩浆已成了冰凉坚硬的石块;当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刀光剑影、威武雄壮的活剧,均化作尘封中蠹鱼啃食的“断烂朝报”……总之,在时间悄无声息的捉弄下,历史潜移默化地由“可能世界”转换成为“现实世界”。历史的“现在进行时态”中,原本具有的纷繁的潜在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才使事物的多向度发展拥有现实的可能性),在流水般时间的销蚀之下,逐渐被人们冷落、遗忘……促成历史从“现在进行时态”向“过去完成时态”转变的相对单纯的诱导因素,则被凸显出来,在有意无意的炒作之下,成为世人瞩目的惟一因素。

《三国演义》小说家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论,常常被一些人当作金科玉律,实际上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盖棺论定。“所谓结局的意思,也不过是说历史的不可逆转,而不是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历史上的种种可能曾经是的事情,并不

是仅由人们的希望而生的鬼怪似的反响,却是错失了种种客观上的可能性——其所以错失,有时由于缺少一位英雄,也有时由于缺少一匹马或一只鞋,但大多数情况是由于缺少理智——特别是缺少那种觉察客观上种种好的可能性所需要的理智”^[1]。“假如”皇甫嵩听从阎忠之言,“假如”何进采纳陈琳、曹操之策,“假如”王允肯“一年再赦”……那么汉末天下之事尚未可知也。无怪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断言:汉末分裂是必然的惟一结局。钱穆先生说:“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渐次削平。若是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2]笔者以为,虽然衰败的汉王朝未必能长期维持下去,控制朝政的曹操式人物最终将取而代之,但统一的汉族国家政权,却并无非得分裂成几块的充足理由。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冬的历史,包括“赤壁之战”,对分裂还是统一来说,无疑是相当关键的。其进程本来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并非只有后人所见的那种“过去完成时态”的表现方式。战前诸葛亮对孙权说:“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3]问题是:当年孙、刘联合破操,是否有绝对的把握?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没有一种人类的活动像战争这样广泛、经常地和偶然性发生接触。偶然性增加了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并对事件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像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4]天有不测风云,数点霖雨足以使英雄气短。如果不是6月17日那场出人意料之外的暴雨,拿破仑也许会追上从四臂村溃退的威灵顿,滑铁卢的结局就可能被改

变。^[5]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征张鲁,攻阳平山上诸屯,对兵三日,既不时拔,而士卒伤亡又重。曹操信心动摇,欲引全军截山而退。因遣将军呼山上兵还,不料被夜色迷惑,误入敌营,敌便退散,曹军因此不战而定汉中。张卫之败更加离奇:有数千野麋夜间突然闯入其营寨,一军大惊;嗣后曹军高祚等人又误与张卫部众遭遇,因多鸣鼓角聚众,张卫以为大军掩袭,惧而降之。^[6]所以英国的威廉·西摩指出:“会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也包括胜利的指挥官)所无法控制的因素。”^[7]正因为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8],充满着难以预计的变数,所以很多军事家取胜之后,往往持重不进,见好就收,犹如当今精明的股市投机者。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冬,曹操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9]。黄武七年(公元228年),鄱阳太守周鲂诱魏大司马曹休入皖。石亭战前,朱桓建议先以“万兵柴路”断其后,然后“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结果被陆逊拒绝。^[10]正如王基所指出的“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便前功尽弃。景元二年(公元261年),王基劝谏司马昭渡沮,不宜重兵深入,进军夷陵,“得之未足为多,失之伤损威重”^[11]。

《孙子兵法·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在后人的眼里,“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孙刘获胜,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而从当时的情况看,曹操之败并非不可避免。先前曹操之得,“非惟天时,抑亦人谋”;曹操赤壁败后,叹无郭嘉,似乎此失,亦在人谋也。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冬的历史,包括“赤壁之战”,其进程本是可

逆的,不属于单向度发展的模式。如果曹操趁东吴水军西上之前,速攻夏口(参见第十一章《战略锁钥夏口与曹操东征之成败》),或者提前占领幕阜山、九岭山西麓的山前地带(今天咸宁、岳阳、长沙一带),便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后详),甚至只要操军早几天出发,在夏口与孙刘联军相遇,即使初战受挫,引次江北,占据今天汉阳一带的丘陵阶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12],结果自然不同。

周瑜战前曾经扬言曹操此番乃是自来“送死”,“将军擒操,宜在今日”。根据是操有“四患”:“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较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13]周瑜“四患”之说,为一些专家奉为圭臬,视为千古不易之论。实际上袁氏家族集团(含并州高干)覆灭之后,北方已经基本平定:辽东公孙康杀袁尚、袁熙,送首级与曹操,更无能力趁曹操在荆州时南下中原;三郡乌丸已迁入内地,成为曹操麾下征战的劲旅。马超帮助曹操平定高干,其父马腾被征到朝廷任职,成为曹操控制马超的人质。马超、韩遂后来据关中反叛,实为曹操遣钟繇讨张鲁,有意借机逼反,并非蓄谋要与曹操争天下。^[14]益州刘璋,自曹操占领荆州之后,几次派人前来表示顺服,并派数百蜀中叟兵到荆州助战。献帝若有被人劫持之虞,曹操完全可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将小皇帝从许都搬到荆州军中,就近控制(后来的司马氏就是这样做的)。从曹操整个控制范围的经济实力与军事优势来看,他完全拥有与联军长期相持的条件。事实上,只要曹操肯听从贾诩的持重之策,不希图“毕其功于一役”,稍待时日,则“又今盛寒,马

无蒿草”，“不习水土，必生疾病”的问题均可避免。

“南船北马”之说，人所共知：江南地区作战，水军的确具有相当的优势。不过从前对南方“以舟楫为舆马”的传统说法，理解上往往过于绝对，以为步兵、骑兵在南方很难发挥其作用。实际上最早建立舟师的吴、越两国，始终拥有独立的步兵，而且是军中的主要兵种。江南地区，从吴越争霸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虽必须以舟船作为辅助手段，但克敌制胜的主要手段，仍是依靠强大的步兵。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一带，古代不仅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步骑战，还进行过对地形条件要求最高的车战，而且规模很大。公元前506年11月的“吴入郢之战”，进抵汉水东岸的吴、蔡、唐联军，约四五万人，用木制战车；楚国军队十万余人，用革饰战车。在大洪山、大别山南麓，汉水以东以北的柏举、清发、雍等地进行了六次战斗，楚军大败。吴军挑选精锐步卒为先锋，五战而占领楚都（郢）。次年六月，秦军遣战车百乘救楚，与楚军残部会师后，在汉水流域的沂、军祥、雍滋、麋、公增之谿等地多次击败吴军，恢复楚国。1274年，蒙元伯颜率军沿汉水南下，“前后延袤，旌旗数百里，水陆并进”，二十余万军队中，虽有不少舟师船舰，但其主力仍是步骑。阿术军在青山矶对岸登舟，载马后随，经中流血战后，攀南岸步斗。岸上宋军稍一后撤，元军便“出马于岸”，发挥骑兵优势，大破宋军。由此可知，“仗舟楫”并不等于“舍鞍马”，南方作战不仅可以用步兵，也可以用骑兵。蒙古、清兵南下，步骑（尤其是骑兵）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详见本书第十二章《赤壁之战战略地理论》）地处江南的东吴，对战马的需求非常迫切：与辽东公孙氏结好，屡次派人去辽东买马；吴蜀通好，诸葛亮亦以马匹相赠。北军南下，“舟楫”主要用于跨越长江天堑。“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

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15]对于已经跨越天险的曹操来说，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庞大步骑之优势，而将手中掌握的水师作为辅助力量。

周瑜意在主战，因而尽“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实纵横家之言。而此“四患”之说，又与后来的事态发展相仿佛，颇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16]黄盖的忧虑说明：曹操即使处于此种不利境地，依然拥有反败为胜之可能。占领长江南岸蒲圻陆口一线，迫使曹操“引次江北”，让其二十余万优势步骑处于实际上的闲置状态，仅仅与其总体战斗力不如己方的水军作战，是联军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尽管达成突然性是采取任何作战行动的出发点，但是……最初达成的（特别是战略上的）突然性效果可能会被以后发生的事件所抵消。”^[17]赤壁初战之后，曹操如能认清形势，明白周瑜的意图，便可以逐步化解周瑜突然性的效果。长江西北岸过于狭窄，通达性、机动性都极不理想。但曹军兵力优裕，在正面无法强攻渡江的情况下，可以分兵向两翼展开，伺机渡江，迂回攻击联军，改变被动状态。曹军可以沿堤岸向东北方向运动，利用兵力优势，拉长战线，迫使周瑜循江回防，分散兵力；如果对岸防守薄弱，或周瑜不予回防，则伺机大举渡江，步骑登陆参与战斗，否则便循自然堤进入黄陵矶—汉阳的丘陵阶地，相机攻击防守夏口的刘琦而夺取之。联军的水上交通线遂险象环生，后方粮秣等后勤接济出现困难，甚至成为失去退路的孤军。周瑜水军初次胜利所获得的空间（地形）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乌有。若曹操不为黄盖的诈降之计所迷惑，毅然决然地走出“圯地”，即使“东南风盛”，周瑜也难取得“赤

壁之战”的决定性胜利。(详见本书第十二章《赤壁之战战略地理论》)

孙子云：“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18]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19]，就是选取抵抗力最小的路线，从心理上说，也就是期待性最少的路线。或从翼侧对敌人实行迂回，或者前出到其后方，这样的机动，不仅可以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且可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战役结局。拿破仑作战，经常采用“迂回到敌人后方”的手法，西方军事家称之为“间接路线战略”。间接路线战略的目的，一是要避免正面强攻直撞的作战方式，使战斗行动尽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同时考虑到物理性、精神性两种因素的结合，使敌人在物质上受到损失，在精神上失去平衡，因而“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20]。正如孙子所指出的：“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21]

公元前 206 年，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给猝不及防的敌军以突然打击，还定三秦。这就是采用间接路线战略而获成功的一个著名实例。深通兵法，“用兵仿佛孙吴”的曹操，对此自然耳熟能详。建安初年（公元 196 年），已经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土地的袁绍，对“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造成很大的威压。曹

操当时忧心忡忡地对荀彧说：“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22]假如袁绍正面以黄河为界，实行攻势防御；同时派兵进行战略大迂回，从并州向西发展，控制关中及凉、益二州，与老盟友荆州刘表打通，形成北、西、西南三面的战略包围态势，如此获得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后，再与曹操决战，则袁、曹相争的结局就会与“官渡之战”迥然不同了。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丸至无终。大水，傍海道不通；而乌丸遮守蹊要，军不得进。曹操听田畴之策，扬言回军，实则凿山堰谷五百余里，从卢龙塞越白檀之险，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200里，乌丸方才惊觉。出空虚之地，掩其不备，大获全胜，追奔逐北。^[23]

曹操如果能以此为鉴，则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的结局，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荆、扬两州的门户，就在北大别、南幕阜这两座像铁钳一样扼束长江的山脉之间。在曹军水师弱于东吴的情况下，以水军为主力沿长江向东推进的战略，充满着许多变数，并无取胜的把握；以步、骑为主力，从长江南岸推进，便是比较明智的理性选择。

随着荆州江南四郡的相继归顺，长江南岸已经落入曹操的控制之中，因此曹军完全可以将前进基地自江陵转移到幕阜山、九岭山西麓的山前地带，步骑前出至长沙、巴丘、蒲圻一线，伺机东进。曹军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路线东进：（1）北路：自咸（宁）蒲（圻）走廊向北推进，威胁夏口与鄂县（今鄂州）、西塞山（今黄石市附近）、下雒（今阳新）沿江一带；（2）中路：由长沙郡汉昌（今湖南平江）经艾县（今江西修水县西马坳、司前附近）、西安，沿幕阜山与九岭山之间的修水流域推进到武宁、柘林一带，指向豫章

(南昌);(3)南路:由醴陵经宜春、新淦(江西清江)进入赣江中游。北路曹军在幕阜山西北侧的军事行动,对夏口的刘备、刘琦部造成很大威胁:沿湘江南撤岭南,投靠苍梧吴巨的退路已被切断;如鄂县、西塞山沿江一带落入曹军之手,其处境势必更加艰难;东撤扬州,靠向孙权,便是惟一的选择。刘备东撤之后,曹军水师便可顺利到达夏口,同时步骑稳步向鄂县、西塞山、下雎一带攻击推进,兵锋指向孙权的大本营——柴桑(今九江)。此举可谓“攻其所必救”,东吴主力将集结在下雎、柴桑一带迎战,水军则会部署在横跨长江的彭蠡泽中。

汉末彭蠡泽,正处于由彭蠡古泽向新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说:古代长江出武穴之后,摆脱两岸山地约束,形成了一个以武穴为顶点,北至黄梅城关,南至九江市的巨大冲积扇。冲积扇的前缘,当在鄂皖交界一线。在《禹贡》时代,江汉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冲积扇上,以分汉状水系的形式,东流至扇前洼地,潴汇而成彭蠡泽;由于冲积扇上汉道众多,《禹贡》概谓之“九江”。当时九江分汉状水系的主泓,自冲积扇南缘流至今九江市后,以“东迤北”^[24]的方向,汇注彭蠡泽。

结合该地区的地貌形态分析,彭蠡古泽的位置在长江以北,具体范围当包有今宿松、望江间的长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区。彭蠡古泽是九江在长江遗弃河段上潴汇而成的,具有河流的带状形态。它既可以称为湖泽,也可认为是长江的加宽河段。由于彭蠡古泽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潴汇而成的,因此水下新老河段之间,脊线分明。当九江主泓,在今九江市折向东北汇注彭蠡泽时,受赣江水流的顶托,其所挟带的泥沙就在主泓北侧的脊线上沉积下来,经过不断沉

积,并和九江汉道带来的泥沙相汇合,最后出露水面形成自然堤,就把彭蠡泽中的九江主泓和彭蠡泽分离开来。

至东汉班固时,原来东汇彭蠡的九江水系,已“皆东合为大江”^[25]。就是说,江湖已经分离,彭蠡古泽面积日渐萎缩。因而人们将江北彭蠡古泽之名用来指长江以南湖口断陷的鄱阳北湖,即彭蠡新泽。彭蠡新泽,位于婴子口以北。婴子口,在老爷岭(属都昌县)与杨家山(属星子县)之间。晋释慧远《庐山纪略》说庐山“左挟彭蠡,南滨宫亭”。晋时宫亭湖指今星子县治至婴子口之间的水体。它应是汉代彭蠡新泽南半部在晋代的异称。^[26]

婴子口,是汉晋时代赣江流注彭蠡的交汇口,形势险要。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欲退豫章,利用婴子口两山挟束、江湖交汇其中的地形,于水中立栅,阻止刘裕的进攻。^[27]杜佑《通典·江州浔阳县》中记载:“宋武帝大破卢循于左里(婴子口东侧)即彭蠡湖口也。”至《水经注》时代,赣水“总纳十川,同湊一渚,俱注于彭蠡也……东西四十里,清泽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根据鄱阳北湖狭窄的地貌形态(最大宽度不超过10公里)和赣江自鄱阳县出松门入彭蠡的形势分析,40里宽的彭蠡泽,当指婴子口以南、都昌县西北一带较开阔的水域。可见彭蠡泽此时已越过婴子口进一步向南扩展。其时间从酈道元称酈阳为“县”而不称“故城”判断,当在酈阳县未撤销之前的公元420年前后。^[28]今天鄱阳湖的主体部分,汉末三国时期并不存在。西汉在今湖盆中心地区设置酈阳县,属豫章郡管辖。《太平寰宇记·饶州酈阳县》中载:“废酈阳县,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酈阳记》云:‘汉高帝六年(公元201年)置,宋永初二年废。’”《同治都昌县志·古迹》载:“古酈阳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

今城址犹存。”说明在5世纪20年代鄢阳县撤销以前，鄢阳南湖的广大水体是不存在的。以鄢阳为中心的鄢阳平原，不但土地肥沃，城乡分布，而且河网交错，水上交通便利，成为当时沟通闽浙的重要交通枢纽。^[29]

敌人的抵抗力，主要由“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两个因素所决定。^[30]东吴的“手段”，乃是以水军立国，靠长江天险，以水战取胜。即使曹操将战线推进到下雒（今阳新）、柴桑沿江一带，依然没有正面突破孙刘联军防线，沿江东下，平定孙吴的绝对把握。因为柴桑江北的湖沼地带，东面的彭蠡新泽（即鄱阳北湖），依然是阻碍曹军东下的屏障。在曹军阵营的水军实力压倒孙刘联军之前，水陆联合作战的结局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曹军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下雒、柴桑战线的正面突破上，应该另辟蹊径，尽量避免在江河湖汉地带与东吴纠缠。

“时间和突然性却正是战争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31]当东吴主力及刘备的军队，被北路的进攻性行动牵制之际，南路、中路应该快速展开行动。修水流域的中路，可以配合北路的进兵，防护其侧翼。北路与中路之间有数道相通。（1）自通城向东南，可以连通位于修水上游汉代的艾县。（2）通山、阳新（汉代的下雒）之间，有向东南经过幕阜山隘口进入今日江西武宁的道路。北路与中路之间，尚有陆水上游通向富水流域的一条道路：自通城至崇阳，走陆水上游；崇阳至通山，绕过陆水支流与富水的分水岭；通山至阳新，顺富水而下。此道既可作为北路进兵时的辅助进兵路线，又可沟通北路与中路。中路的军队如果能顺利推进到武宁、柘林一带，不仅北路的侧翼受到保护，而且可以直逼豫章（南昌），东进赣北的鄢阳平原：因为其处于比较平坦的修水冲积地带，地面起伏较小，曹军的步骑已经可以发挥其优势。南

路可分为两支:北支经浏阳入江西,向东沿锦江经万载出上高;南支经醴陵入江西萍乡,向东沿袁水经宜春出新余。两支中间有几条可以互相连接的通道。从上高、新余向东,逐渐进入平原地带,然后便可合兵攻打豫章(南昌),分进合击,同时与中路进兵的曹军在赣江西岸——九岭山脉东麓的山前地带连接起来,并从南面向北攻击柴桑,与北路相衔接,利用兵力优势,迫使东吴势力从幕阜山东麓、彭蠡新泽(即鄱阳北湖)西岸逐渐退出,依靠其水军优势,以彭蠡新泽、赣江作为天然屏障进行防守,隔湖对峙。

如此情势之下,曹军趁机东进,推进到鄱阳平原与赣江中游地区。曹军进入汉末豫章郡(东吴时析为豫章、庐陵、临川、鄱阳四郡),蚕食鄱阳平原之后,将豫章郡分隔为南(赣南)、北(赣北)两部分,东吴对赣南的控制将会被遮断。如果临汝(抚州市)、葛阳(弋阳)、上饶一线进一步落入曹军之手,不仅彭蠡新泽(即鄱阳北湖)东岸吴军侧翼受到威胁,同时曹军掌握了东进浙江(会稽郡北部)、南下福建(会稽郡南部)的主动权。

骑兵是适于进行运动和大规模决战的兵种,“在骑兵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将寻找广阔的平原并乐于采取大规模的运动。由于我们控制着空间,因此敢于进行比较大胆的迂回和比较冒险的运动”^[32]。曹军步骑进入鄱阳平原之后,对彭蠡新泽(即鄱阳北湖)东岸的吴军后方造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已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优势步骑进入江南地区,在岗丘低矮,地形条件并不复杂的冲积平原上,完全可以与东吴展开陆战。“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这是东吴投降派的重要理由之一。周瑜赤壁之胜,与其初战后迫使曹军引次江北,重夺长江天险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隔江对峙,曹军步骑岂能袖手旁观。只要剥夺东吴“长江”、